

“蒋”

—— 蒋林散文随笔集

话

——
蒋 林 著

“蒋”

—— 蒋林散文随笔集

话

蒋林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话:蒋林散文随笔集/蒋林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5650-2855-7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527 号

“蒋”话

——蒋林散文随笔集

蒋 林 著

责任编辑 王钱超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人文编辑部:0551-62903205	印 张	12.2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189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昶颜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855-7

定价:29.8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Contents / 目录

讲点什么(自序)	(001)
----------------	-------

第一辑 讲点老话

有关校园这个林子的杂记	(003)
父亲是一名战士	(015)
镌刻在春天的文字	(019)
桂花是母亲留在人间的心愿	(021)
菊花脑的滋味	(024)
JL126	(027)
二十三,猛一蹿	(029)
跟儿子唠嗑 ——写在儿子博士毕业之际	(033)
跟儿子再唠嗑 ——写在儿子结婚仪式之后	(041)
唠叨	(045)

第二辑 讲点痴话

我看美国	(051)
从曲阳,到渔阳	(057)

天长是个好地方	(060)
人在峡谷里穿越是一种修行	(063)
岁月里有一段京剧唱腔	(066)
“听”“说”扬剧《双下山》	(069)
“玉”说还休	(071)
落发与蓄须	
——写给自己的五十周岁	(075)
侄孙女使我成为爷爷	(077)
剪一把荻草带回家插	(079)
寂寞的广玉兰盛开在郊外	(081)
锦鲤作为一种被寓意的吉祥	(082)
心动沭阳	(083)
顿时好感全无	(085)
信寄 2016	(086)
夏威夷,太平洋深处的一滴欢愉	(088)

第三辑 讲点真话

天长“师爷”钱玉亮	(095)
乡情是一种终生难以摆脱的纠缠	
——序夏万全散文集《望故乡》	(100)
慧眼透视雾里花	(103)
白描方洪	(106)
天才吟唱在低处	
——在“诗人天天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109)
天空下的定远县	
——为《生态定远,美好乡村掠影》摄影集写的序	(111)
定远县博物馆	(114)
我送孩子上少年班	
——回答一份采访提纲	(116)
回答《滁州日报》采访	(120)

有话好好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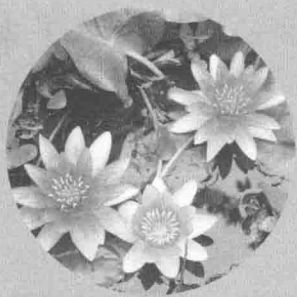
- 在2012年“《滁州日报》暨滁州中学高考作文赏析会”上的
发言 (126)

让诗歌具有文化和知识的气质

- 在“第二届全国教师文学表彰奖”颁奖会上的发言 (129)
- 偶尔获奖是必要的 (132)
- 回头望月 (134)
- 花园湖还在,诗社散了 (137)
- 不喊主席,喊郭老 (139)
- 公刘先生,我想你了 (141)
- 人生以淡泊结尾,真好 (144)
- 与戴煌聊天杂记 (147)

第四辑 讲点闲话

- 微博,是一种好文体 (157)
- 西行微博实录 (158)
- 观后微感 (163)
- 读后微感 (172)
- 对日微感 (179)
- 微微一笑撕斯文 (182)
- 微微一笑揭伪装 (184)



第一辑 讲点老话

流传已久的话叫做老话。人在年轻时偶尔能讲几句老话；有了年纪，就容易老话连篇了。亲人之间，往往也是老话在引导亲情生长和蔓延，老话在这里就像春雨和秋阳。

有关校园这个林子的杂记

我拥有教师身份三十二年了。

工作第一年，是在城边的一个村小。其后，调回县城，在一所中学当保管员、当体育教师、当政治教师、当办公室主任，一晃，就是三十二年。我不是教坛新星，不是骨干教师，更不是模范教师，一般得很。我工作之余爱好文学，写诗写得多。我的职称是中学一级，评得很晚；我的“头衔”是省作协会员，加入较早。

我从小喜欢唱歌，曾是小学文艺宣传队队长，做过“台柱子”。我当学生，一直是班上同学公推的文体委员——我也喜欢体育，篮球打得还不丑。我的这点文娱、体育爱好，一直到当了教师、当了丈夫和父亲，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往身上来，还不舍得丢弃。我多少有点“不现实”。

《Let It Go》，这是美国动画片《冰雪奇缘》的主题歌。你五十多岁了还看动画片？看，但看得少，因为儿子的科研方向是计算机图像学，与动画有点关系；这一部，主要是喜欢片子里“随他吧”这个口气，这个口气勾起了我许多的生活经验；我多年来对现实生活始终抱有这个态度：随他吧。

我办过诗社。我觉得校园不应该只被“考试”两个字霸占。那时，我年轻，热情压倒一切；后来，因故停办。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花园湖还在，诗社散了》，心里有点忧伤。

我读过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徙》，那真是一篇忧伤的小说。忧伤的心境里，我突然觉得，校园里是应该有些传承的；比如有一首校歌，被一批又一批纯真的声音传唱。

汪先生小说里的校歌是这样的：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
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我读过之后闭上眼睛，觉得画面很美。

我还觉得画面似曾相识。我工作的学校，颇有些来历。从现在是一所县城完中这个事实，向以往追溯，是县城中学的高中部、县城师范、西关小学、西禅寺——这就要遥望到民国了，甚至更远。就是说，“我校”是建在一所寺院的基础上的，而“西寺晚钟”又曾是小县历史上的八景之一（你看看，文有八股，景也总有文人能够搜寻到八个，到处都有）。学校的西边，紧邻的是老护城河的西段，县城变了样子，这一段的水就被营造成了一个小湖。湖畔西北位置的高地上过去住过一家老红军，每逢重大节日，县里领导要登门慰问。湖中央还有盛开桃花、梨花的小岛，被叫成了“花园湖”。这样一来，汪先生小说里的校歌意境，多少与我坐拥的环境有些相似，牵强得上。

我从小生活在中学校园里，一岁时，从另外一个学校搬到了现在这个校园。我在这个校园里蹒跚学步，“那天，我们一转脸，他居然自己扶着墙走到了操场上！”我母亲一回忆就是我在这个学校学会走路的画面。我今年五十二岁了，见得最多的就是中学教职工。我觉得老一代的中学教师身上，旧知识分子的气息比较浓郁，虽然他们已经穿了中山装、干部服，但换上长袍、戴上围巾，老派的气质就会迅速回到身上。不知怎么的，我喜欢民国时期的那种带点迂腐味道的人，我觉得轻微的“迂腐”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我总觉得西服领带大背头不适合中学校园。我还觉得老一代校工虽然大多没有文化，但他们跟“先生”处久了，嘴里也能偶尔来几句文绉绉的话，加上他们做事板扎、做人老实，在校园里就像远房

亲戚来家帮忙似的，让人心里感到亲近。这是本分人特有的魅力。校工，现在几乎是个绝迹的岗位，很多学校请物业了，叫作后勤管理社会化；条件差一点学校偶尔还请临时工做事，“工人”都首先要谈“给多少钱一个月”，谈得清清楚楚，额外的事不做，不主动做，给钱少了也不做。人心大概不古了。受这种“小人”见识的影响，我心里想象的校园和实际存在的校园，总是存在着抵牾。

我记事时，校园就乱了。一开始，学生们文斗还挺热闹的，有人大庭广众之下，站在课桌上慷慨陈词、哇里哇啦，能赢得一片掌声，就像个连环画中的大英雄，这叫我佩服；武斗了，能说话的学生动手能力弱，打不过就跑，好多学生跑到我家里躲，我父亲就护着他们，叫追击的同学“回去、回去”——我父亲从部队回来就在学校里工作，是个抗战的，学生再乱，到我家门口多少都有点心怀敬畏，就暂停。但在我看来，那些讲话很厉害的人，原来只是看起来视死如归，其实并不是真正想捍卫什么的大英雄样子，我多少就有点瞧不上。我眼里的学校虽然乱，但热闹，对我来说，符合男孩子对世界的本能认识，是个好玩的事情；现在看，就是一种影响了，负面的，可能对一生都不好，就像在身体里置放了一些异物，又排泄不掉，终究是个隐疾。

学生大乱之后，学校恢复了一些宁静，一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师不再大话连篇、议论国是了，常常聚在一起娱乐。政治风气下，能娱乐什么呢？唱歌赋闲——这些人，吹拉弹唱的都会一点，不唱土的不唱洋的，唱样板戏和电影主题歌（后来知道，《十八摸》《小寡妇上坟》以及《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人是会唱的），摇头晃脑，味道十足。当过新四军的老校长一家人都上阵，老头拉二胡，儿子、女儿分别唱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老太婆唱沙奶奶；老体育教师美声唱得不错，保留节目就是《红星照我去战斗》；校医小金真是金嗓子，不仅李铁梅、小常宝唱得好，郭兰英、王昆也唱得极相似——她嫁了个区委的干部，丈夫严肃，她只好把骨子里的天真烂漫，从家里寄放在单位里了。我在少年时代悄悄地喜欢过三个成年女人，其中一个就是她，那时，我既叫她金老师，也叫她金阿姨，但我心里一直叫她小金！

工宣队进驻校园了。有个女的姓冯。冯队员好像对“斗争”不太感兴趣，就主动要求带我们初一年的音乐课。音乐课就是教唱歌，不教乐理——她似乎不识简谱，更谈不上五线谱了。冯队员在课堂上不像教师，像阿

姨、像二舅妈、像邻家老嫂子。她好像会唱广播里的所有歌曲。她上课，就是把一张写大字报的白纸挂在黑板上，上面有抄好的歌曲，带我们一句一句学唱：“夜半三更盼天明——唱”，“夜半三更盼天明”；“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唱”，“母亲只会泪淋淋”！我们上小学就会这个歌啦。“接下颌子，调皮！”哈哈哈哈哈！我们对其他课越来越不感兴趣，我们就喜欢每周两节的音乐课。我们好像喜欢的是对学生稍微和蔼一点的人。

数学老师姓万。我最早知道他，不是叫万老师，而是老碧子，同事和邻居都这么喊他，他名字里有个碧字。老碧子一个人在校园里教书，老婆和四个儿子在乡下。老碧子这种情况在城里很普遍。老碧子不愧是数学专业的，打扑克牌四十分算计起来，总能把对家算死。老碧子教书有点“眯”，能让人睡得踏实。老碧子在音乐方面没有长处，就喜欢喝点小酒，很少喝瓶装的，大多是芋头干酒。晚上喝过酒就更“眯”了，端个大瓷缸到老校长门前当观众，自带小竹椅，二郎腿一翘一翘的，不一会儿，就有鼾声了。

老碧子有天晚上在街上喝过酒回家，停电了，摸错了门——他的隔壁是女生宿舍，门也恰巧没关——就一头倒在了墙角的床上；又恰巧那张床的孩子回家了，没人，一开始并无动静，不一会儿老碧子的鼾声惊动了其他同学，就炸窝了！第二天老碧子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灰头土脸的，大家就知道老碧子的这次“眯”，差点惹了祸，被熊得不轻。大家还知道老碧子其实是个老实人，不是那种人。

老碧子把大儿子带进城上初一，没到一学期，大儿子被查出了白血病，在合肥住了一阵医院，然后就死了。我们班同学捐了款，好像是二十多块。老碧子那阵子给我们上课，再没人闹瞌睡了。以后，老碧子家人陆续进城，挤在两间屋子里，老婆没工作，二儿子考上一家国营企业，三儿子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小儿子没考上什么，就跟着父母生活。再以后，老碧子退休了，依旧是一天两顿抿点小酒，饭后在校园里转一转，嗅一嗅花，打打招呼，平平淡淡。某晚，脑溢血，没了。

曾贤达和钱惠珍在小县城人眼里，是可以仰视的两口子，是夫妻中的夫妻。这对上海人，男的是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女的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一个英俊，一个漂亮。夫妻俩受到委派，来支援县里的五七大学，来了，就蹲下来了，多少年回不去。田间地头办的五七大学撤了之

后，他们被调到县城里的中学，就住在我家隔壁。

夫妻俩在上海有一儿一女，女儿老大，聪慧，儿子老二，智障；姐弟俩的照片就放在他家的写字台上。夫妻俩都带高中课，都受学生追捧，“我们曾老师上课从来不带书，一支粉笔写一黑板，我的乖来，真有货！”“我们钱老师那英语才叫英语，跟电影里的宋美龄讲得一样。哪像谁谁谁讲的英语啊，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也不懂！”他们家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涌来，有的问习题，有的帮家务，夫妻俩不烦学生，学生的尊敬和崇拜也都是真的。夫妻俩跟教师相处，男的入群，女的清高。男的渐渐与本地人打成了一片，会讲不少土话俚语；女的朋友少，白天上课，晚上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仅与一个上海下放知青、后来考上教师的同乡交往——这同乡也是女的，也在本校工作，说话软绵绵的，年轻，但没有钱老师好看。夫妻俩每次回上海，都要替同事、邻居带许多上海货，我家的第一台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和一个精巧的针线盒就是他们带的。我常吃到大白兔奶糖。学校的年轻老师旅行结婚，只要选择了上海，曾老师都会打长途电话，告诉老父亲在自己家腾出地方，让他们住一两个礼拜，还请吃；结婚的老师回来后，都满口感激，还说：你家的那张黄铜大床真排场！

不知怎的，曾老师居然与同乡的知青老师、钱老师的闺蜜好上了，被钱老师“逮”了现行。钱老师不像小县城妇女那样闹，没闹，只是坚决请求组织上将自己又调到了乡下。钱老师的英语教学水平呱呱叫的，在乡下埋没，那哪里行呢？上面知道她这个情况，没到一学期，就把她调到了地区行署的中学教书。在那里，钱老师与一个天长的男教师有意思了。消息传到县城，曾老师抽了大半包“百寿”烟，然后，把几个铁杆学生找来，眼泪汪汪地告诉这几个愣头青，说：“我被钱老师甩了，甩了就甩了吧，她还气我，跟别人好。你们要真是我的学生，就去教训一下那个男的，千万要记住了，不要动手，吓一吓就行了。”曾老师到底是个智者，这一招，奏效了！

不久，随着上海人纷纷返城，钱老师也很快回沪了，据说与曾老师办了离婚手续后去了美国，而曾老师在县城越来越不像个上海人了，睡懒觉、喝醉酒、生活不讲究了，还与县城著名的混子交往。原先的那个上海的女知青教师没跟他，跟了下放时的男朋友，远走高飞了。

曾老师在离开县城的最后几个月，与我这个师范刚毕业的小邻居玩得甚是开心。他打扬琴，我弹吉他，县城的著名混子放声歌唱“你到我身

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每每至半夜。我父亲终于受不了邻居的这种生活变化，就找个机会与他沟通：“曾老师，你看，我家儿子刚参加工作，老是揪着你们玩，混吃混喝的，就不求上进了。你没有事的时候，多教他学好，骂他打他都可以，你是长辈嘛。”曾老师多聪明啊，一听就知道意思了，说“没事没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曾老师再没勾混子来校园喝酒唱歌。曾老师与县城的“名流”玩，主要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吧，他孤身一人，是不是也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教训”他？也许是。

曾老师毕竟是有影响的老师，有人想“挽救”他，意欲提拔他做副校长，但是曾老师谢绝了；费了些周折，联系好下家，在一个春天也调回了上海。曾老师虽然是教物理的，但他读过许多名著，诗词张嘴就有，文艺体育方面也是个多面手——他排练的表演唱《码头工人之歌》，获全县中学生文艺表演第一名；他会打排球、乒乓球，踢足球，还会下围棋和蝶泳，我非常佩服。我没见过世面的心在想：这就是传说中有本事的人。他们夫妻对学生影响很大，教的那几届，物理与英语成绩往往超出其他科目很多。他们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并不完美。他们虽然是大上海的，也跟小县城人过的生活相似。这大概是他们夫妻俩当初来的时候始料未及的。

曾老师回上海的那天上午，我在家门口与他挥了挥手。他上车，我转身进家，趴在床上流泪。我们有点忘年交的意思。这么多年了，他再没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联系过，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吴老师是庐江人。庐江人自己把“庐”读作“驴”，驴江。她也教英语，教初中。她在课堂上常挂嘴边的话就是：考上考不上大学，就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关系。她说她小时候翻几个山头去上学，每年穿坏草鞋无数，“现在，呸，我穿的是皮鞋！”她的皮鞋，每天，不，每时每刻都擦得锃亮。她有两双猪皮鞋、一双牛皮鞋。她长得虎虎生威，我有点怕她。她带过我两年班主任，我也坐了两年的单人座位，而且在全班的最后面、最拐角。她不喜欢我，除了我调皮捣蛋之外，还认为我虽然在学校居住，但不是真正的“老师”家的孩子——我父亲是部队转业的伤残军人，母亲是普通职工；而她丈夫是县委的干部，应该比我们家高级。但现实是，我们不仅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喝一口井的甜水，每天平起平坐，早晨起来一样的蓬头垢面生煤炉、倒痰盂、打招呼，而且我父亲的工资居然比她丈夫

高！这可能有点气人。不过我在她手下当学生，她还是能找到平衡的。好在那时上学，孩子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家长是不在意的。

吴老师在家是一把手，丈夫不是。女儿叫妮，儿子叫虎，在我们的毕业合影里，妮子和虎子都被吴老师拉进去了。虎子留在照片上的样子很乖，不知道是不是与在全班合影之前，有人用弹弓打他的额头有关。我“意外地”考上师范后，曾给吴老师写过一封信，大意是感激、不忘之类的文艺腔调，吴老师拿到下一级学生面前，大声朗读，并说：“‘我们老师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是很懂事，这才毕业几天，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就给我写感谢信了。他，真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孩子啊！”吴老师在教我的时候，对中国科技大学首招的少年班宣传很多，恨不得也能亲手培养几个送进去，却总是“恨铁不成钢”。我与那个叫宁柏的神童，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那时，这个全中国最著名的少年，是我做梦都想痛殴一顿的家伙！由于有宁柏、少年班这个情结在，没想到多年后，我儿子居然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个班。吴老师调回老家很多年了，但她对原单位的事情十分关心，经常与好友电话联系，谁提拔了，谁倒霉了，谁还那样，谁死了，她都知道，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教师。吴老师听说我儿子高考结果之后，“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吱声”，我想，她大概一下想到了很多事情，语塞了。

有个叫小邓的家伙，我要说一说他。

这家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上高一，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从定远跑到黑龙江中苏边境，被捉了回来。我在学校的批斗大会上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剃了光头，穿一身据说是他父亲的抗美援朝旧军装，被反剪双手押上主席台。他为什么要越境？学校说想叛逃。“边境”和“叛逃”这两个词让我们低年级同学崇拜得要命。这是1977年冬，没想到，1978年夏，这个全县有名的坏学生考上了师范学院数学系，而且是我们中学这一届唯一的本科生。按说，一白遮百丑，考上大学穿皮鞋了，也为老师挣了光，会得到些赞誉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老师公开表示不喜欢他，即使他考上了大学。“这家伙，脑子怪活络的，但人品有问题”。他怎么在老师眼里留下“人品问题”印象的，我不知道。没想到，1982年，他分回了母校，与很多不喜欢他的旧日老师成了同事，这让有些知道他底细的人感觉“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小邓当教师，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不晓得他有什么路子，有两年他

居然做起了淮南、淮北的煤炭生意！真的西服领带大背头了，整天夹个包在校园里牛逼哄哄的，不是嘲笑老教师穷、“伤蛋”，就是讽刺新教师呆、“无能”。学生反映，说他不备课，一堂课只上半节，而且经常被学生问作业问得支支吾吾、红头酱脸的。小邓糊弄校长，说：“我适合做行政管理，教书这种简单劳动实在是对我的侮辱。”校长将计就计，说：小邓啊，我正准备培养你呢，你看看你这么有能力，代几节课的确是浪费了。这样，这学期还有两个星期了，下学期，你到校长室，我这里正好缺个办公室主任！”小邓龇牙一笑，说：“校长你放心，你放心，我保证这是你当校长以来最正确的决定。”谁知，没等到学期结束，小邓跑了——恰逢1988年海南建省，什么样的孔雀都往东南飞。临走时，这家伙还骗了学生近千元的资料费，说那资料是通过专门渠道搞到的，是高考命题专家编的。儒雅的校长闻讯后黑着脸，愣了片刻才说：这个熊孩子！

日子继续，小邓渐渐被人忘了。但他在县城的知名度不小，总有人在坊间传播他的消息：说他在海南开了家公司，赚了不少钱；说他上个月回合肥住在银河大厦宾馆并带了个香港的三级片女明星；说他业务做到了国内广西和国外越南；说他吃了官司；说他准备回来投资办学了！投资办学这事有点影子——1999年，他回学校转了一圈，但凡家里有小孩子的，他都会上门递上四百元的红包。一开始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晚上我做东，请当年几个同事陪他喝酒，他说出了原因：某老师的老婆是他年轻时的梦中情人，总也不能得手，这次回来无论如何要到她家去看看，以给小孩红包的名义比较能得到认可，说不定还会有小酒款待，“哪知道他还是和多年前一个熊样，水都没给喝一杯！就防着我跟他老婆讲话了！”小邓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梦，撒了好几千块钱。“你他妈就是个甩种”，我在席间骂他。喝酒的时候，小邓说马上要回来办学，“三千万够不够？”跟小邓平时能聊得来的老康说够了、够了。小邓说：“就这么定了，你老康当教导主任，不要在这个学校受鸟气了；你老程当校长，老同学了，调了这么多年也进不了城，我这下让你一步到位，你帮我代管，我是常年要在外面的，在家蹲不住。”我趁机往上凑，问他：“那我呢？邓总你他妈没安排我吗？”小邓说：“安排了，安排了，你老弟给我当办公室主任兼保卫科科长。”小邓跟以前一样，吹牛至高潮，抑扬顿挫、行云流水、神鬼附体、欲死欲仙，能进入忘我的境界；用马季相声来形容，就是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那脸哪去了呢？——吹牛的人不要脸啦！

有关小邓的最后消息是：被更大的骗子骗了、破败了，早就回家待着了，不好意思出门；口袋比洗的都干净，撮油条的钱都找父母要；回家也待不下去，到蚌埠一个亲戚那里混生活，不成；又到四川的一个亲戚那里了，混什么，不详。小邓现在应该五十大几了，混世界的资本越来越少，一个曾经的好脑子也就接近了报废。学校有人总结说：这泡烂泥终归是糊不上墙的。有道理。

有件事，也可以说一说。

家父到了离休的年纪，在家有些伤感。伤感什么呢？像他这样的抗战干部在教育部门少，在校园里更是绝无仅有。虽然应该享受离休待遇，但无官无职的，在一个中学校园里有什么好享受、有什么好待遇呢？看看家住的两间旧社会西门大地主家粮仓改的老房子，虽说是扶梁扶柱的架构，但天阴漏雨、天晴掉土的状况，几十年未变。家父对校领导们说：“老伴单位在门前搭的小厨房太破了，请学校领导考虑帮我们修一修，这就算是我离休的一点要求吧。”

按说，时任校领导们一天的招待费就足够解决这个芝麻大的问题了，但事情一经人为，芝麻就变成西瓜了。

校长们日理万机，抓政治、抓业务、抓基建——抓校园有史以来的第一栋教师宿舍楼建设，就是没有人来抓一个伤残的新四军老战士的小事。家父的性格一生刚烈，但自从我调回学校、与他成为同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打个比方，就是狮子变成了猫。这是父亲为儿子考虑、是他自己内心世界“计较”的结果。时间一天天拖，我看到家父眼里的不满日益增多了，老猫变回狮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饭桌上，家里人都在回避“修厨房”这个话题。我心疼得要命。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无意中听老师们说：宿舍楼盖好了；他们校长家里的住房也重建竣工了。咦，这是怎么回事？答案说来就来，没过几天，承包商与校领导在校园里公开发生冲突：校领导指责承包商“要价太高，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而承包商的笑脸终于在挂不住的情况下，把领导们搭宿舍楼建设的顺风车、改善自家住房的事实，给吼了出来，“去你妈的，老子不做你们学校工程了还不行吗？！”这边，我闻讯后心情复杂，又设想家父闻讯后会爆发出怎样的反应，一夜不眠。我决定要出手了。我不在乎修不修什么厨房，也不在乎出手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更不在乎“他们领导”所谓的里子面子；我在乎的是我要将矛盾引到我身上来，让家父站在